

鄭樵《通志略》中所顯示的撰寫特色 與科學方法之探索

葉鴻灑

(淡江大學史學系退休教授，本會通信會員)

摘要 本文內容重點，在嘗試透過瞭解南宋學者鄭樵撰作《通志略》¹的背景，及書中包含的內容，以解析其在撰寫方法上所呈現的特色及科學精神。本文包含下列五項內容，分別是：前言、鄭樵生平事蹟介紹、《通志略》的撰寫背景與特色、《通志略》中所用科學方法之探索、結論。

關鍵詞：南宋、鄭樵、通志、二十略、通志略、特色、科學方法

一、前言

中國史書之多，體例之豐富，可說是今日學術界之瑰寶。其為人所熟知的，除了一套二十五史及《資治通鑑》外，應屬以記錄典章制度及社會文化內涵為主的三通：《通典》、《通志》及《文獻通考》了。而《通典》與《文獻通考》二書，比較偏重在將過去相關的資料加以整理編輯、評斷其優劣，並指出其實用功能，而鄭樵的《通志》，自唐代史評家劉知幾到近代史學大師章學誠、梁啟超、錢復等都一致認定，此書無論在體例的安排或內容及撰寫方法上，都獨樹一格。尤其對其書中具有濃厚研究精神而為其獨創的《二十略》，給予相當高的肯定。本文即在嘗試從瞭解鄭樵的生平背景及所學，並透過其書的內容，去分析其書中〈二十略〉部分所表現的特色，及寫作過程中所顯示的科學方法。

(《二十略》由台北里仁書局發行單行本，書名使用《通志略》，本文所用資料以此一版本為主，故以下皆稱《通志略》)

二、鄭樵生平事蹟介紹

鄭樵是中國南宋初年的史家，他所撰寫的《通志》一書被中國史學界認為是繼唐代杜佑《通典》以後的又一部敘述中國歷代典制文化的巨著，與元代馬端臨撰寫的《文獻通考》合稱為保存中國歷代典制文化的三大名書。而其書因獨具別裁，頗為清代史學家

葉鴻灑，已退休，仍從事史學研究，研究方向以中國史學發展及科學發展狀況(偏重在唐宋階段)為主。現旅居加拿大，電郵：hongsa_yeh@hotmail.com。

¹ 原書屬鄭樵巨著《通志》中的一部份，原名〈二十略〉，後世出單行本，改稱《通志略》。本文採用單行本之名。

章學誠先生所讚賞，特別撰寫了一篇名〈申鄭〉的文章以表揚之，盛讚其書：「卓識明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²，而《通志略》被視為是書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鄭樵生於北宋末年的徽宗崇寧三年（1104），卒於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字漁仲，因曾長期閉關讀書於夾漈山，為學者尊稱為夾漈先生。³是當時的福建路興化軍興化縣（今屬福建省莆田縣）人，其父鄭國器於北宋徽宗時曾任職太學，在重和二年（1119）於返家途中病逝於蘇州，時鄭樵年僅十六歲。他在將父親靈柩迎回家鄉安葬之後不久，就在夾漈山結草蘆與其堂兄鄭厚一同閉門苦讀，不問世事。徽宗靖康元年（1126），一位曾任職樞密使的官員宇文虛中因罪降調到福州，因而認識了鄭樵兄弟。不久，靖康之役爆發，北宋政府在處置失當的情形下於次年為金軍（女真）滅亡（1127），康王趙構於逃亡途中倉卒建立了偏安江左的南宋政權。南宋建立之初，金軍步步進逼，激起了各地愛國志士抗金衛國的熱誠，這時的鄭氏兄弟也不例外，毅然結伴下山，初始苦於報國無門，後得知所結識的宇文虛中時已官復簽樞密院事，遂書寫了慷慨激昂的自薦書，透過宇文虛中轉呈當時主事者之一江常（職銜為給事中），表示兄弟倆決心報效國家，抵抗金兵，有「勃勃雄飛氣吞逆虜」之志，決心「以革裹屍而後已」⁴，時鄭樵年二十四，其兄年二十八。

然而，因為時機不對，未被重用，缺乏適當的從政機會，報國無門，乃專心研經究典，在夾漈山過著讀書寫作的生活，決心將自己的理想與主張寄託於字裡行間。為了多方蒐集資料，鄭樵曾經遍訪名山大川，蒐集異聞奇書，更盡力結交當時的藏書名家，將這些名家的藏書全部借讀完畢才肯罷休。由於他的努力不懈，為他的不朽名著《通志》一書的豐富內容奠定下了堅實的史料基礎。

南宋政局稍安之後，為了讓朝廷瞭解他的學問與才華，也為了取得官方對他修史書的允准與支持⁵，在高宗紹興十九年（1149）將其部分書稿上呈給高宗，並附了一篇「獻皇帝書」，清楚說明自己的志向與計畫，深獲高宗之讚賞與鼓勵，於是返鄉繼續著述。至紹興二十七年（1157），正式獲得高宗授以官職並給以「筆墨紙硯」，助其修書。至紹興三十一年（1161），終於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通志》一書的全稿，再度上呈給高宗。惜高宗因事未能即時接見，至次年正式下詔欲接見鄭樵並肯定其書時，鄭樵已因病而逝，享年五十九歲，未能親見其書之通行天下。

三、《通志略》一書的撰寫背景與特色

（一）撰寫背景

鄭樵出生與成長於史學、哲學（理學）與科學皆十分興盛發達的北宋後期，當時的

² 見·章學誠〈申鄭〉，《文史通義》內篇四，國史研究室印行，1972,4月

³ 此說引自大陸學者劉節在其作品《中國史學史稿》中的資料，台北，弘文館出版社出版，1976,6月初版

⁴ 見鄭樵，〈與景章兄投宇文樞秘書〉，《夾漈遺稿》，收錄於《百部叢書集成》文學類，詩文別集，宋，藝文印書館印行）

⁵ 因為在當時若私自撰寫「國史」是會被治罪的

前輩學者們如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子（程顥、程頤）、司馬光---等對宇宙自然萬物的觀察與研究都有著濃厚的興趣，也都有自己的觀察結果與說明文章⁶，如張載先生在其所著「正蒙」文中以氣之聚散變化為萬物形成之源曰：

氣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 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⁷。

鄭樵雖成長於戰爭連年的北宋末年，然而當時自由的學風並未受到戰爭的遏阻而消失，反而因為中央政府政權的崩潰而消除了箝制的力量⁸，因此鄭樵得以在夾漈山自由的研讀他有興趣的各類書籍。南宋朝廷建立後，他因為人際關係的不足，想從政立功以流芳百世而不可得，乃決心研習學問，希望能對整理與傳承傳統學術與文化盡一份心力。

北宋中期（仁宗、神宗）以前，學界本來十分重視與國計民生相關的實用之學⁹，然而到了末年的徽、欽二宗在位（1100-1126）後期，由於政局的腐化及當權者的窮奢極慾，社會動盪不安，加上理學研究逐漸脫離現實面而趨向空洞虛幻，遂使學界出現了「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¹⁰的現象，鄭樵對此現象十分憂心，認為長此以往若沒人關心與重視，將使學術界會與自然知識及實用技術嚴重脫節，因此，他決心盡一己的力量以匡正之；加上他自年輕時讀書即興趣廣泛，博覽群書。當他經過長期對傳統學術之研讀與了解之後，發現中國古代的學問本來就是博大精深，包羅萬象，因此激起了他欲撰寫「集天下之學於一爐」作品的雄心壯志，並計畫以通史之祖司馬遷的撰寫方式與體例為依據，並擴大其範圍，除了包括用通史體裁寫作的歷代政治演變，以貫徹其強調史學著作應該經脈相連，首尾相通之外，為了保存一般學術界所忽視的社會科學及自然史料，特別將此部分撰寫成獨特的單元，名之為〈二十略〉（即今日之《通志略》），舉凡歷代中國文化中有關金石樂律、氏族譜牒、文字典制、器服圖譜、祥瑞災異甚至昆蟲草木都整理編納進去。經過長期的努力撰寫，鄭樵最後終於完成了他的心願，撰寫了他的巨著《通志》一書，並在他的書中包括了各種以實用知識與自然變化的內容為主的〈二十略〉。（今日書局單行本名之為《通志略》，以下皆稱《通志略》）

《通志略》包括二十個單元，故稱之為《二十略》，分為五十二篇：依序為氏族略六篇、六書略五篇、七音略二篇、天文略二篇、地理略一篇、都邑略一篇、禮略四篇、諡略一篇、器服略二篇、樂略二篇、職官略七篇、選舉略二篇、刑法略一篇、食貨略二篇、藝文略八篇、校讎略一篇、圖譜略一篇、金石略一篇、災詳略一篇及昆蟲草木略二篇

（二）《通志略》的撰寫特色

由於在鄭樵之前，中國史學界介紹歷代典章制度的專書，具代表性而為史學界所

⁶ 有關北宋各位著名學者的對宇宙萬物的解釋與看法詳情請參閱拙著〈北宋學者的自然觀〉，《淡江史學》第四期，頁 17-25

⁷ 見清·全祖望撰〈橫渠學案上·正蒙〉《宋元學案》卷十七，中華書局印行頁 671

⁸ 因為在徽宗在位時曾因政爭而頒布元祐黨禁，禁止了司馬光、蘇軾等學者作品的流通，對北宋後期的學術自由形成相當程度的箝制作用，詳情請參閱黃宗羲、全祖望編著，〈元祐檔案〉，《宋元學案》卷九十六，台北·華世出版社出版

⁹ 詳見葉鴻瀾著〈有助於科技發展的新儒學之誕生〉一文，見《北宋科技發展之研究》第三章第一節，台北銀禾文化事業公司出版，1991,4月初版，頁 84-102

¹⁰ 見南宋·鄭樵，〈昆蟲草木略序〉，《通志略》，台北里仁書局出版，1982,8月台一版，頁 785

肯定者，僅中唐杜佑所撰寫的《通典》一書而已。鄭樵學識淵博兼又用功甚深，對他所完成的《通志》一書十分自豪，尤其是他對書中所自創的《通志略》部分，更是滿意。他曾自負的留下「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的序言¹¹。又說「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¹²而據後世學者的研究，也大致肯定其《通志略》的史學價值，以下依個人淺見，將其《通志略》中所表現的特殊之處，分成數點加以解析說明之。

1、重視典制「會通」之功能

鄭樵在為其書所寫的總序一文開端即指出：

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¹³

文中強調所有宇宙萬物的運作以及人事的安排都必須遵循一個「會通」的原則才能井然有序，正常運作，而學問的研究道理也一樣。因此，他讚美太史公的《史記》「擅制作之規模」而責備班固的《漢書》「遂失會通之旨」。他曾批評由於斷代為史致使曹魏之史書必稱吳蜀政權為「寇」。而北朝史書則稱南方東晉政權為「僭偽」，南朝史書則稱北朝為「索虜」，使得史書的紀錄出現不公不正的筆法，是十分不得體的寫法¹⁴。他不但在通志略的每一單元中，內容的安排全部始自上古時期：如其〈氏族略〉、〈職官略〉起自唐、虞、夏、商，〈都邑略〉始自五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天文略〉始自堯命羲和觀象察法以定曆法---甚至其中以介紹昆蟲草木為主的〈昆蟲草木略〉亦以中國最早的一本介紹動植物藥材為主的《神農本草經》為解說的源頭，每一單元皆依時間的順序介紹各類典制及事物的發展，尤為重視事物在每一階段的演進變化。這種強調「會通史事於一爐」的主張，在其書中無論是在介紹史事或自然萬物的變化上，都表現得十分明確，頗為後世史家所認同。如清代史家章學誠在其《文史通義》一書的「申鄭」篇中即盛讚之曰：

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¹⁵

民初史家梁啟超先生亦讚其欲糾正班固以來斷代為史的缺失曰：「宋鄭樵生左、馬千歲之後，奮高掌，邁遠蹠，以作《通志》，可謂豪傑之士也」¹⁶。而從二十世紀以後的今日，世界史學界均重視了解人類在整體歷史發展的脈絡看來，鄭樵的這種主張是十分先進而有意義的。

2、強調著述內容應博雅兼具

鄭樵在少年時代便立志「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¹⁷，而在他的〈通志總序

¹¹ 見南宋·〈總序〉，《通志略》，台北里仁書局出版，1982,8月台一版，頁3

¹² 同前註

¹³ 同前註，頁1

¹⁴ 參閱錢穆，〈鄭樵通志〉，《中國史學名著2》，台北三民書局印行，1973,2初版，頁250

¹⁵ 參閱清，章學誠〈申鄭〉，《文史通義·內篇四》，台北國史研究室出版，1972,4,初版，頁134

¹⁶ 參閱梁啟超，〈過去之中國史學界〉，《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章，台北里仁書局出版，1994,12,初版，頁66

¹⁷ 見鄭樵，〈獻皇帝書〉，《夾漈遺稿》，來源同註4

文中也強調「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¹⁸他雖然十分肯定太史公《史記》一書的通史體例與撰作規模，但他卻批評《史記》一書因受環境因素所限致使在「博、雅」方面仍明顯有所不足：

當遷之時，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互三千年之史籍，而舉踴勝於七八種書，所為遷恨者，博不足也---今遷書全用舊文，兼以俚語，良由採賾未備---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¹⁹

因此，在他撰寫《通志》一書時，不但在其有關政治歷史的演變部分博覽群書，即在介紹各類社會文化與自然知識的「略」中，亦不例外：如在介紹歷代金石碑刻的〈金石略〉中，僅漢代碑刻就收錄了兩百餘件，其中尚有三分之二記有刻碑時間及立碑地點，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實屬不易。又如在介紹歷代昆蟲草木的〈昆蟲草木略〉中，述及「蘭草」的相關知識時，分別引用了《楚辭》、《名醫別錄》、《神農本草經》、《開寶本草》等典籍中的資料，詳細說明蘭草的別名、功用等，其文曰：

蘭即蕙，蕙即薰，薰即零陵香。楚辭云：滋蘭九畹，植蕙百畝--故名醫別錄出薰草條。近方謂之零陵香，故開寶本草出零陵香條，神農本經謂之蘭。臣昔修本草，以二條貫於蘭後，明一物也--。²⁰

類似之例，隨處可見於其通志略的各單元中，限於文章篇幅，不再贅述。

3、能在前人的基礎上融會貫通，深入解析，以祈讀者能真正瞭解其內容

前已述及，在鄭樵撰寫《通志》以前已有唐代的杜佑撰寫了以介紹自古至中唐的典章制度為主的《通典》一書，鄭樵雖肯定杜佑的著作體例與方向，但他並不以延續《通典》一書的撰作方向為滿足，而是計畫撰寫一本能超越杜佑，在內容上能「通古今之變」又能「網羅天地之間所有真知實學」的巨著。如他在序文中批評古之史官「徒相尚於浮言」。又在解釋「志」體例的來龍去脈時批評「史記、漢書」以後史書之作者所撰寫之「志」皆虛浮不實曰：「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²¹失去了《爾雅》一書當初敘述典制之真義，此故，他在撰寫《通志略》的內容時，於前人的知識並非完全照單全收，凡見前人之記錄有所不同者，必經過他自己詳細之研究查證，將所查考的新史實記錄於所收錄的前人文章後面，以正視聽。如在介紹昆蟲「蟬」時，根據前人之書所記作了多元而仔細的分析說明，文曰：

蟬之類多，爾雅及他書多謬悠，惟陶弘景之注近之--蟬類甚多，莊子云：螻蛄不知春秋，則是今四月五月小紫青色者。而離騷云：螻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此乃寒螿耳，九月十月中，鳴甚淒急--寒螿與螻蛄類也，故名號相亂。凡本草所載名號有相亂者，皆是物類近似，固有互名。非若他傳釋有名號相亂者，非互名也，皆是訛謬---²²

文中經過他個人的考證研究，肯定了陶弘景《神農本草經集注》中相關記錄之可信

¹⁸ 見同註 10

¹⁹ 同前註

²⁰ 見南宋·鄭樵，〈昆蟲草木略第一·草類〉，《通志略》，台北里仁書局出版，頁 786

²¹ 同註 10

²² 見同前註〈昆蟲草木略第二，蟲魚類〉，頁 802

度，而對諸如《莊子》、《離騷》等古籍中中有關蟬的紀錄則多所批評。類此例證，尤多見於其〈器服略〉、〈校讎略〉、〈昆蟲草木略〉等篇章中。

四、《通志略》中科學方法之探索

(一) 重視證據之搜求以求得真知識

鄭樵生於十分重視實証之學的北宋時期，受到當時學風的影響，在撰寫文章時，強調著書立說應「言而有據」，對於無法實地觀察或獲得實証的傳統知識，不但不予採用，而且多加指責，他甚至由於認為《漢書》作者班固作學問不夠徹底而盛責之，甚至稱班固為「浮華之士，全無學問，專事剽竊」²³。

由於他強調知識的紀錄必須是經由實地觀察或經由嚴格考據後才能紀錄下來，流傳給後學。因此，他對虛幻色彩濃厚的古代陰陽五行的思想，是抱持著懷疑與不信任的態度的。如他在序文中說明他何以未在通志略的項目中列入「五行」單元時說：

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董仲舒以陰陽之學，倡為此（五行）說，本於春秋，牽合附會---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災祥略。

²⁴

文中強調自然間的災難與變化是可以實際觀察得到的，但人間禍福的產生，卻很難事先預知的，如何能根據五行的循環變化的理論，將昆蟲的變異，或物種之不正常與人世的禍福混為一談呢？所以他在編寫通志略的單元時刪除了「五行」的部分而根據實際觀察資料作了〈災祥略〉。

又如他說明撰寫中國境內所有之昆蟲草木資料時必須經由實地觀察「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本之精神」²⁵，還需詳讀古籍，而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才能完成其〈昆蟲草木略〉這一單元。

而這些主張及方法廣泛的出現在〈六書略〉、〈天文略〉、〈金石略〉、〈七音略〉、〈災祥略〉等多篇的序文及內文說明中。

(二) 強調應重視圖譜之輔助功能

鄭樵之重視圖譜，不但見於其文中強調圖譜與文字書籍之不可偏廢，文曰：

---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亦為功。離圖即書，尚辭務說，故人亦難為學，學亦難為功--秦人雖棄儒學，亦未嘗棄圖書---²⁶

又特別撰寫了一卷〈圖譜略〉以展示其此一主張。他在〈圖譜略〉的單元中，不但將當時保存下來的二百二十六幅圖譜（包括表）名稱一一列舉出來（如唐洛陽京城圖、唐長安京城圖、氣象圖、攻守器械圖、難經圖、金丹圖、月令圖一等十分多元化），也將他查得的已失傳的圖譜區分為地理、會要、紀運、百官、易、詩、禮、樂、春秋、孝

²³ 同註 15

²⁴ 同註 10，頁 5

²⁵ 見同前註

²⁶ 見鄭樵，〈圖譜略第一，索象〉，《通志略》，台北里仁書局出版，頁 729

經、論語、經學、小學、刑法、天文、時令、算數、陰陽、道家、釋氏、符瑞、兵家、藝術、食貨、醫藥、世系等二十六類，並分別將失傳圖譜的名稱列舉出來以供後學之參考。而在他的〈六書略〉、〈七音略〉兩單元中，對中國文字的演變流傳，尤其對繁複雜難懂的，參雜了胡人音樂的唐代以後的中國樂音變化都經由圖表作了清晰的說明。²⁷

(三)字裡行間充滿濃厚的懷疑精神

眾所周知，人類學問之不斷進步，好奇與懷疑精神，是必不可少的要素。鄭樵《通志略》一書主要價值之一，應為其書在中古時期的中國學術界，已蘊含著濃濃的懷疑精神，並不斷的嘗試去解開他所感受到的疑團，如他在〈器服略第一〉中解釋釋奠之禮所用之器時即有：

…原其製作，蓋本於禮圖，禮圖者，初不見形器，但聚先儒之說而為之。是器也，姑可以說義云耳，由是疑焉。由疑而思，思而得。²⁸

強調由懷疑而會去思考研究，然後才會「有所得」

又如在其〈昆蟲草木略第一·草類〉中談到「菟絲」時，完全否定《淮南子》書中附會無稽之談：

菟絲曰菟蘆—淮南子注云：菟絲生茯苓上，故世言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又言菟絲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掘取，割其血，和丹服之立變化。今皆不然。茯苓生山谷，菟絲生人間，何由同居²⁹？

他努力探求所得到的答案，以今日水準論斷也許仍然與科學真相有所距離，但他所表現的懷疑與研究精神，應該是值得學界給予肯定與學習的。

五、結論

總之，鄭樵所撰寫的《通志略》一書，雖成書於約九百年前的中國古代，但作者窮一生之功力，且又用力甚勤，兼之該書體例特殊而又內容豐富多元，雖因時代背景及資料來源所限，內容或有部分乖離不確之處，但仍不失為一本值得今日學者給予肯定的巨著。

主要參考文獻

- 鄭樵，〈夾漈遺稿〉，收錄於《百部叢書集成》文學類，藝文印書館（台北），1965 年
章學誠，《文史通義》，國史研究室（台北），1972 年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三民書局（台北），1973 年
鄭樵，《通志略》，里仁書局（台北），1982 年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里仁書局（台北），1994 年

收件日期：2009 年 11 月 15 日

定稿日期：2009 年 11 月 19 日

²⁷ 見同前書〈六書略第一〉，《通志略》，〈七音略第一〉，《通志略》台北里仁書局出版，p109-11 及頁 174-196

²⁸ 見同前書〈器服略第一·尊彝爵角單之制〉，《通志略》，頁 786

²⁹ 見同前書〈昆蟲草木略第一·草類〉，《通志略》，頁 317

Study of Scientific Methodology and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ong Zhi Lue”

Hong-Sa Yeh

(Ret. Pr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TamKang University, Correspondence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By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and content of “Tong Zhi Lue”(通志略),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cientific spirits of the writing methodology of Zheng Qiao (鄭樵) in writing the “Tong Zhi Lue”. This articl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ive parts. Introduction, Zheng Qiao’s life, The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ong Zhi Lue”, Study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used in “Tong Zhi Lue” and Conclusions

Key words: South-Song Dynasty, Zheng Qiao, Tong Zhi, Tong Zhi Lue, Characteristics, Scientific methodology